

从孔龙村遗址看西北彩陶南传之路

考古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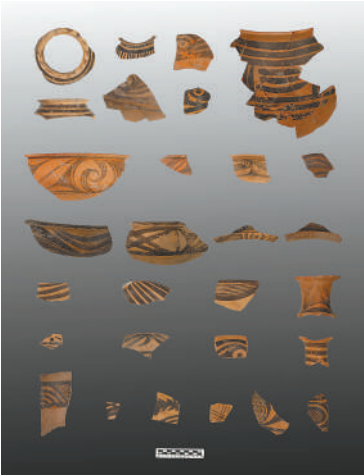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孔龙村遗址的发掘，是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

孔龙村遗址地处大渡河正源脚木足河东岸二级阶地，海拔近2500米，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5500—4800年，是迄今川西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配合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工程建设，2023年6月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址持续发掘，至今已发掘1.7万平方米，包含居址区、公共建筑区、手工业生产区、大型壕沟和墓地，是一个要素完整的史前中心聚落。

孔龙村遗址发现了大量彩陶，绝大部分出土于遗址生活区，几乎全部为完整器破碎后被随意丢弃的残片，极难复原。已出土残片近万件，器类包括豆、钵、盘、盆、瓶、壶、罐、瓮等，考古工作者努力修复出完整彩陶器10余件，复原出完整彩陶纹饰20余套。尤为重要的是，遗址早期阶段的彩陶为典型的仰韶文化晚期偏早阶段（石岭下类型）风格，为川西高原首次集中发现；中晚期阶段包含若干马家窑类型风格和本土特色风格，部分见于川西高原以往发掘的遗址。

川西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是黄河中上游以外发现史前彩陶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区域。川西彩陶主要发现于岷江上游与大渡河上游地区，另在雅砻江上游、大渡河中游和属于黄河流域的川西高原北部松潘、若

高寒



孔龙村遗址出土彩陶残片及考古工作者修复的彩陶器。

高寒供图

孔龙村遗址出土彩陶残片及考古工作者修复的彩陶器。

石器彩陶南传的天然廊道。目前看来，彩陶南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肇始期为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阶段，距今约5500—5100年。川西彩陶主要见于孔龙村遗址，与之相似的彩陶见于甘肃地区的大地湾、傅家门、山那树扎、大李家坪等遗址，彩陶纹饰以弧边三角纹、网格纹、旋转变体鸟纹等为典型代表。繁荣期相当于马家窑类型的早中期阶段，距今约5100—4900年。川西彩陶广泛见于四川大渡河上游与岷江上游地区，哈依、刘家寨、营盘山、姜维城以及新近发掘的孔龙村、罕额依遗址均有发现。彩陶纹饰题材大为丰富，以粗细弧线纹、横竖平行条纹、十字纹、圆点纹等为主，出现少量草叶纹、爪纹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图案。衰落期相当于马家窑类型晚期，距今约4900—4700年。此时川西彩陶分布范围更广，但整体已

开封城里觅包公

韩阳

我从小在开封城长大，在还听不懂《七侠五义》的年纪，就常在离姥姥家不远的包公祠玩耍。稍长些，爱看电视剧《包青天》，听老师讲“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包公的掌故在开封家喻户晓，但开封有关他的真迹却很少。人们所熟知的，开封博物馆藏有一通《开封府题名记》碑，上面镌有北宋历任开封府尹的名字，如范仲淹、欧阳修等。到包拯处，却是一个拇指大的坑。据说千百年来，所有见过这块碑的人都会不自觉地用手指寻找并摩挲包拯的名字。久而久之，包拯大名就这样被磨成凹痕，成为“碑上无名，但有口皆碑”的千古佳话。

2023年春节，朋友拉我逛清明上河园。信步走进一家文博博物馆，墙上一幅篆书拓片引起我的注意。文字为“龙马负图处”，再看落款，“嘉祐二年三月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包拯”。没想到，老包居然有墨宝存世。但我随即想，原碑可能已不知所终，大概不在开封，于是仅拍了照，未作深究。

晚上和父母闲聊，未承想一向对文史并不热衷的父亲说他知道原碑在哪里，就在离家不远的北大寺。他晚上常和几个朋友散步，其中一位朋友就是北大寺的管理员，提及他们那里有块包公碑，还曾邀请大家有空去看。闻此我兴奋不已，包公遗碑居然近在咫尺，当即兴冲冲决定去访碑。

转天一早，我和父亲从河南大学东门出发，绕道学校西门，很快就到了北大寺。寺院不大，管理员顺手一指，我们便看到这块碑。碑身嵌在大殿卷棚北壁门额上，5个字古雅端庄，包拯题名清晰可辨，宋韵气象扑面而来。更惊喜的是，此碑对面的南壁门额上，嵌有一块清朝名臣阿桂所撰《包拯碑铭记》，简述了碑的由来。乾隆五十年（1785年），河南布政使江兰因梦指引，“取土数尺之下，遂得是碑”。驻汴治河的阿桂为此慨然写道：“汴梁为宋故都，孝肃为宋名臣，大书深刻，信而有证。”有学者据此提出，“龙马负图处”碑原本为仓王庙所立，明末黄河决口，庙毁碑失，后被江兰重新发现。

晚清时，包公碑再度流入民间。光绪时重修北大寺，寺住持素喜金石，就把这两方碑收至寺内并嵌入门额，保存至今。

那天，我们转身往回走时，正好看见管理员在墙上钉“文物安全责任公告牌”，牌上专门印有文物保护单位、直接责任单位、综合管理部门等信息。见此，我愈发相信，包公碑会得以善存，包拯的更多印记也会被进一步发掘、发现。

我家有文物

上新了



银扣鸟兽纹漆厄。

南京博物院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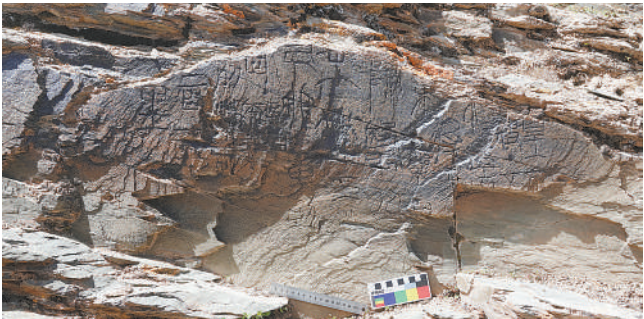
近日，南京博物院推出年度特展——“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通过7个篇章呈现了西汉时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展览中的“广陵”并非单指现在的江苏扬州，而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眼中的“东楚”地区，包括了江苏的江淮地区与安徽的东部区域。这里盐铁资源丰富，水网密布，经济发达，考古发现的漆木器生产历经200余年而不衰。

广陵漆木器种类繁多，功能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一生所需。胎体多为红胎，颜色

从“朶日塘秦刻石”到“大昆仑考古”

杨雪梅



朶日塘秦刻石。国家文物局供图

文字是古文字中比较容易辨认的，因为它和小篆、隶书一脉相承，与我们现在的汉字系统也最接近。刻石内容很重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它的发现地点。在玛多县，在著名的三江源地区，这个环境太特殊了。”

朶日塘秦刻石一经披露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考察研究后认定：“朶日塘秦刻石”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

海拔4300米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城8月底就开始飘雪了。在这里进行考古，常人难以想象其中的艰辛与困难，但对于多年在青藏高原发掘的考古人来说，只要天气晴好，“一切都还好”。

围绕朶日塘秦刻石的考古工作是“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至2028考古计划”的组成部分。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三年计划总调查面积为700平方公里，目的是全面勘察这一区域的文物遗存情况，探索区域文化内涵。

因为处于国家生态保护区核心范围，无法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只能选取重点区域、重点遗址。2026年度的发掘面积是50平方米。“我们在刻石下方区域布了探方，争取能找到刻石上碎裂脱落的残片，使刻石内容更加完整。同时寻找秦代的活动面，为刻石研究提供尽可能多的背景信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金涛说。

8月21日，参加“昆仑文化论坛”的学者从青海西宁驱车460多公里来到玛多，稍作休整，即前往朶日塘秦刻石原址考察。鄂陵湖和扎陵湖纯净如画。刻石就在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处，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青山面水”的景观。近距离观察可以看到，刻石所在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壁面磨蚀风化严重，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但自右向左、自上而下的37个凿刻文字大多可以清晰识别。

年近80岁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称此行是“圆梦之旅”。来到刻石原址，他非常激动，“秦

呈渐衰之势，彩陶工艺较为粗糙、数量大幅减少，纹样题材单调，地方特色的草叶纹依然流行。可见，这一阶段川西与西北史前文化的联系渐微，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的文化交往互动进入低潮期。

最新研究表明，不同阶段的川西彩陶既有从西北地区直接输入的，也有本地制作的。大部分早期阶段的彩陶应是随西北地区迁徙人群或贸易交换直接输入，稍晚阶段普遍出现了一定数量本土制作的彩陶，其陶土成分和制作工艺不同于西北地区，部分纹饰具有本地特色。彩陶从直接输入逐渐开始本土生产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川西高原，在马家窑类型彩陶分布边陲区的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青海湟水流域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阳山和乐都区柳湾等墓地均有发现，彩陶的传播促进了不同区域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

孔龙村遗址发现的彩陶，延伸了川西彩陶的年代上限，将中国西部彩陶南传之路的开辟时间提前至仰韶文化晚期阶段。西北地区彩陶人群南下至川西高原后，与本土人群不断融合发展，同时与黄河上游地区持续交流互动，大幅拓展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分布区域。部分彩陶人群沿岷江南下进入四川盆地，促进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推动了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起源进程。同时，以彩陶为代表的史前农耕文化沿青藏高原东缘进一步向南发展，推动了川西南、滇西北地区的文明起源进程。

交融，不仅仅体现在彩陶这一典型器物上。川西高原与黄河上游在考古学文化很多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包括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的生业模式、陶窑、房址、灶等日常生活遗迹，各种材质的环镦、发笄等装饰品，陶塑、彩陶图案中的鸟、蛙崇拜，陶鼓、陶铃、石磬、玉钺体现的礼乐文化等，全方位再现了长江、黄河上游史前族群的互动交流和融合发展图景，实证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博古知今

廓清『秦人尚武』之说

许卫红

“秦人尚武”之说由来已久。似乎“尚武”是秦国独有的精神气质，并成为解释秦国最终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把观察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大环境，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战国”本指七大强国，自刘向汇编《战国策》后，“战国”固化为时代专有名词。彼时，战争是各国生存竞争的核心手段，尚武是社会性的普遍现象。齐国有“勇爵”“齐人隆技击”以及“五都之兵”；魏国有严苛的武卒选拔标准；赵国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长平之战、邯郸保卫战之顽强坚守；楚国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疆拓土和新杀敌将可以封上柱国、赐上执珪，又有秦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一语成谶；韩国号称“劲韩”，天下强弓劲弩多出自韩国；燕国地处北疆，却有乐毅率领五国联军伐齐……

《诗经》同样可以印证尚武是时代共同特征。《秦风》中《无衣》《小戎》等篇目常被用来证明秦人尚武，但整部《诗经》中描写各国战争、军容等的诗篇有30余篇。《豳风·破斧》写周公东征战士的自豪；《邶风·击鼓》记录卫国士兵出征，既有战阵描写，也有战士生死盟约；《郑风·清人》铺陈郑国兵车军容……尚武题材并非秦国独有的文学表达。

尚武的社会风气，在物质层面体现为各国兵器制造业的普遍进步，考古出土文物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楚国出土战国兵器数量庞大，仅雨台山558座楚墓就出土兵器500余件，中小型墓葬普遍随葬兵器，兵器种类完备。江陵秦家嘴楚墓出土双矢并射连发弩，是早期连发弩实物。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铜剑多达32把，部分青铜剑表面发现人工富锡硬化处理技术，金属加工技艺水平很高。

传统认知中，燕国国力偏弱，燕下都44号武士丛葬坑却出土大量铁制兵器，包含铁剑、铁矛、铁戟、铁镞。金相检测显示部分兵器使用高碳钢淬火工艺，将我国淬火技术的使用年代推进至战国晚期，可见燕国先进冶金技术大量投入武器制造。

曾国是姬姓小国，曾侯乙墓出土兵器4700余件，墓葬竹简记录大量弓、矢、戈、戟，出土多戈戟、殳等以往罕见兵器，人甲、马甲制作精细，代表先秦皮甲工艺的高峰。三晋兵器普遍使用“令工冶”三级监造制度，郑韩故城窖藏一次性出土战国晚期韩戈、矛180余件，大量器物带纪年、职官铭文，还出土铸造戈铭的石质范模，证明韩国兵器已实现规模化铸造。

后世常常以“虎狼”“尚武”概括秦人，这种认知有两处来源：一是战国纵横家出于外交对抗，对秦国作战风格的敌国修辞；二是后世以秦统一的历史结果倒推民族性格，把制度塑造的效果误读为族群固有天性。其实，在尚武的时代共性之外，秦人自身的精神世界同样具备多重维度。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提出官吏精洁、正直、谨慎等德行标准，蕴含着儒家道德理念。凤翔雍城遗址、咸阳秦墓出土的“忠仁思士”类的私印，表达了对忠、仁、敬、慎等价值的推崇。咸阳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陶垫上留有印章压印的“敬事”文字，语出《论语》“敬事而信”，代表从业者对职业持恭敬勤勉的态度。

秦始皇陵兵马俑常被视作秦人尚武的视觉符号，但高级军吏俑双手交垂、按剑而立，姿态克制沉稳，凸显将领的智谋，并非一味凸显冲杀勇武。秦代官员履历也体现文武兼备，内史腾既可以作为地方长官颁布政令安抚新占领土地，又可以领兵攻城灭国；秦武王时期，甘茂既主持修订田律，又能率领兵攻打宜阳。军政职能集于一身，是秦官僚体系中的常见现象。

人名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投射，研究者对秦简人名的统计，为观察普通秦人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新视角。可考释人名共680个，品德类人名64个，其中数量最多的依次为表达谦恭、忠义、宽仁的人名，表达刚勇的数量最少。简牍材料上的人名来自底层小吏、黔首，反映出战国晚期秦民间的真实价值取向——国家层面奖励军功，但普通民众取名并不优先追求勇武人格。

“秦人尚武”只反映秦人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只有把尚武还原到战国整体时代背景之中，才可以更加客观地理解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制度变革以及秦统一的历史逻辑。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文化遗产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周飞亚